

教学参考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

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

(内部材料 不得翻印)

上 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编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编 者 话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主持下于1980年10月6日至11月6日在我校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三百余人。到会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多年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会上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党史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并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功绩和失误作了初步的探讨，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一些问题也作了讨论。

根据代表的要求和党史教学的需要，我们将会上十九篇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成上、下两辑，刊载在我校《教学参考》上，供大家研究党史时参考。由于时间紧迫和我们的水平所限，特别是有一部分材料是根据录音整理的，难免有不妥之处，希同志们批评指正。

这份汇编的印刷，承滁县地委《滁州报》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同志们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

王 斌

目 录

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廖盖隆(1)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马齐彬(46)

※

※

建国后十七年党史概况……………张 弓(70)

关于从中国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

……………李蔡元(85)

关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陈诗惠(95)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李蔡元(107)

农业合作化历史几个问题的研究……………许永杰(119)

关于党的“八大”的几个问题……………张 弓(128)

“大跃进”的失误及其经验教训……………孙 梁(137)

关于庐山会议的几个问题……………陈诗惠(162)

八字方针的贯彻和党的“十中”全会……………滑 隆(173)

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

廖盖隆同志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1980年10月25日

同志们：

我要讲的题目叫做《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我讲的还是老话，基本上是7月22日在中央党校讲的内容。但是，做了些补充。我准备做一些解释。特别是，对于今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行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问题，作一些说明。

我讲错的地方，请同志们不客气地指出、批评。首先讲一个问题，就是建国三十一年以来的党史的轮廓。

一、建国三十一年以来党史的轮廓

我们认为，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党史的分期，不是任意要这样分那样分都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其中有些时期合起来，但是，合起来，我看还是两个时期。比方说，1949年到1956年，这中间实际上是分成两个时期的，1949年到1952年，这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1953年到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七年，在这七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可以这样来分。但实际上这是两个时期。56年以后，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算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大概可以说是曲折前进的十年。在曲折中间前进的十年，也可以说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的失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十年，大概可以分为三段，一段是正确的，路线正确的，一段是犯了错误，还有一段是改正错误。那么，这是第三段了。第四段，“文化大革命”，要打引号，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动乱。第五个时期，就是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

现在我就分别来讲一讲，这五个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一些问题。我来讲话以前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讲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因为这个决议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还不能讲。我只是就我个人理解的一些问题来讲一讲，所以说这不能称作什么传达。

现在讲第一个时期。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1949年到1952年，三年。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因为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了，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相当于原来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在我们中国的表现形式，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相当于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但是，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概念，是不是很完善呢？看起来不是很完善的。因为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人民，不只是无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等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本身，不能包括这个其他部分的人民也参加这个统治，参与这个政治统治。特别是，这个专政是什么样的专政，也没有说明白。毛泽东同志提出来一个名词，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这个范围是很广泛的，他接着下个定义：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采取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这么个方法来进行统治的，所以叫做人民民主专政。那么这个概念，是更科学、更完善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代替马克思原来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指出这么一点，就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上胜利了。作为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这是不是奇谈怪论？我觉得不是。因为列宁讲过，反复地讲过，革命的基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建立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那么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了吗？在我们这样说的时侯，我们就会想到毛泽东同志曾经批判过的一种观点，就是批判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这里毛泽东同志批判的，是指在历史上认为革命不要分阶段的那种错误观点。就是说，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就去执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一般地去打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他批判的是那个观点。但是，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到了1945年以后，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发生了个变化，这就是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革命任务，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没收官僚资本，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另外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另外，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在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专政，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我这里可以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论述。一个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他是这样说的：“1949年开始，我们就没收全部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二十多亿，官僚资本总有二百多亿。”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插话：“连帝国主义的是二百多亿。”这是连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资本了。毛泽东同志继续说：“这一部分帝国主义资本同官僚资本拿到工人阶级的政权手里头，这是什么革命呢？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因为是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资本的性質就变了。变成是社会主义的了。所以，我们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为什么市场能够稳定，国家能够控制呢？你看十个指头占了八个半，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呀，十个指头占了八个半，也就是百分之八十五，占了

这么多，这是讲工业。至于农业那个时候还是私人的，到后头合作化了，成了集体的。土地改革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我们不停止在这上面，七年之内合作化就基本上完成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就肯定1949年没收官僚资本，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了，这是社会主义的了。这是一个材料。另外在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关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面直接讲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他的那个谈话，记录里头是这样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它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毛泽东同志讲过去那个混淆是不对的，但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这怎么理解呢？恐怕应该这样来理解，在提出反官僚资本以后，就解放战争那个时期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是完成了民主革命；另外一方面，作为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完成了。这不就是毕其功于一役了吗？所以在这个时候讲是可以的，恐怕是应该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同志讲：“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这是大概的数目，刚才讲是八点五比一点五，这里是讲八比二。“我们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所以我们看1949年革命胜利和胜利后不久，不仅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把中国的主要的资本主义都消灭了，经济革命也开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把官僚资本、把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把它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又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以后，这部分已经被我们没收了，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把它征用了，实际上已经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革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1949年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作为社会革命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还只是社会经济革命的开始，象刚才所讲的把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也开始了。后来，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所以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49年开始的，1956年基本完成。为什么说1949年的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把这个道理说了一下。那么，我们说在这一段啊，使用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这就可以把这个时期的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的斗争，党的整顿和建设，没收官僚资本，并且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把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内了，因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包括了这些任务。如果我们只讲恢复国民经济呢，就很难包括这些斗争或者工作。在这些斗争和工作里面，土地改革是属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其他各项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包括抗美援朝，这也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

如果我们把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比较一下，那就更清楚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苏联的工农社会主义政权，可是它的政权是很不巩固的。它是城市起义以后建立起来的全国政权，刚一建立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后来经过三年内战，才战胜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乱和十四个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才巩固下来。打个比方吧，我们的解放战争是进行在前面，但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是在后面进行的，建立政权以后又打了三年解放战争。我们是先打了三年，取得了胜利。所以我们革命一胜利，我们建立的政权是巩固的。而苏联呢？因为还没打过仗，刚刚起义取得胜利，它是建立政权以后再进行三年解放战争，然后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是一点。我们中国的1949年的革命胜利不是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要大一点，还要巩固一点吗？

另外一方面，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他就宣布把全部私人工商业都没收，结果在共产党方面一点准备也没有，实际上管不了那么多的私营工商业，号召工人起来接管，结果把国民经济搞乱了，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后来不能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我们只是没收大官僚资本，官僚资本的大企业，有多少呢？有二千七百多家。而我们在解放区长期进行了建设，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经济的干部，虽然不很多，但管理二千多个企业还是管得过来的，所以有条不紊地接管了这些大官僚资本企业。另外，又收回了一部分外国垄断资本企业，数量有限，这个接收工作很顺利，改造的工作也很顺利。而对于大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它们一共有几百万家之多，虽然总资本占的分量很少，但是企业数量很大，其中大部分是个体的工商业，一点也没动，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样做国民经济秩序不发生紊乱，人民生活也没有遭到损失。所以，我们的政治秩序是好的，避免了经济上的混乱和破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的革命由于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接受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由于毛泽东同志长期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我们1949年的革命是非常成功的，是非常伟大的。

这一段有一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什么？在北京有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到现在还提出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认为这个时期（1949年到1953年）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完成，大约在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土地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既然土地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他们认为也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就是说，革命性质还是民主革命的。这个对不对呢？这个看法有部分道理，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那里的主要社会矛盾，的确还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那里在1949年到52年要解决的还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呢，就不是这样，从全国范围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了，在政治革命方面已经胜利了，经济革命也开始了，没收官僚资本，把它改造成国营经济，这个很严重的步骤已经采取了。所以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社会矛盾，已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很明显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只是部分的新解放区的农村的情况。新解放区的城市，也不是这

个样子，全国范围也不是这样。新解放区的城市也要没收官僚资本，在那里也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怎么能说还是民主和封建的矛盾呢？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主要的矛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到1956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应该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里头，这七年里头还可以分两段来看。头一段就是恢复时期，1949年到1952年。这三年主要的社会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大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的矛盾。因为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可以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这两个范畴。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工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尖锐的对抗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年解放战争，一方面是要解决中国人民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民主革命。另外方面，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有两重性，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革命带有两重性。那么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非常对抗性的矛盾，已经因为工人的胜利而基本解决。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残余势力的矛盾，这还是对抗性的矛盾。在1949年到1952年这个时期，这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它可以说是残余势力，但这个残余的力量也不小。国民党的残余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大陆上有一百多万，反革命分子呢，包括他们留下的特务，以及历史反革命，一共有几百万，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被我们镇压的就有七、八十万，在镇反运动中间，关起来的、管制的还不算，总数目大约有几百万。所以，在当时剿匪反霸的斗争，当时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追击战，当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两项运动，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的斗争形式。到1952年，这个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的力量、主要的部分也被消灭了。1953年到1956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认为可以说是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和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人民政府要限制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右翼分子的反对限制反对改造之间的斗争，也就是限制、改造与反限制、改造之间的斗争，这就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斗争的形式。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说法，“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可以看出来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这个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就是可以在经济上用和平的赎买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用给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以出路，就是给予选举权，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给予改造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消灭资产阶级，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头

说的一句话了。根据后来历史情况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我们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是头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年到1956年四年。这个阶段的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就是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此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原来在1949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到这个时候又在我国建立了完全的或比较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了。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当然,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它的初期发展阶段,还是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说是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呢?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的生产力还很落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应该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大生产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生产力还很落后,我们的大部分的经济部门还是使用手工劳动,没有使用机器。所以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很落后,在中国出现的社会主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这样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资本主义,它也有手工业的时期呀,如工厂手工业时期,有机器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社会主义不也可以有手工业时期吗?我们现代的手工业,以及用手工操作的农业,的确它又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个体私有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是落后的,生产力很落后。不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而是大部分还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工农之间的本质差别还存在,当然别的差别,例如城乡的基本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很大的差别都还存在,因此,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作为残余形态还存在。1956年以后,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残余,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残余。由于剥削阶级的残余存在,所以阶级斗争的残余也就存在。我们使用这个概念,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的残余,是为了区别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情况,因为1956年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它只剩下一个残余形态,主要的矛盾已经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在我看就是转到人民内部矛盾了。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那个时候发表的讲话本来讲的意思也是这样。说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就是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吗!主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所以,什么叫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呢?就是生产力还很落后,就是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阶级斗争的残余。不管怎样,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的意义的重大,可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相比较,相比拟。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是很成功的,基本上是很成功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有些同志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不承认我们党这样做

是正确的。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太早了。不承认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不承认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认为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我国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成绩没有缺点，作为第二位的问题缺点和错误还是存在的。

主要的缺点，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主要是从1955年开始，出现了比较急躁，工作中比较粗糙的现象。所谓急躁，就是说，不照顾到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群众觉悟的情况，千篇一律一下子就实行高级合作化。比较粗糙，就是采取了简单划一的办法，留下了不少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一年一个高潮，无论在农村在城市在改造中间都遗留了一些问题。拿城市来说，象陈云同志讲的，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把一些不应该取消的小东西取消了。拿现在来说，可以说我们把城市里流动的商业服务业小工业网点，商业服务业的网点缩小了，过分地缩小了。举北京来做例子，1956年全市有五万多个商业服务业网点，改造以后，一直到现在只有一万多个商业服务网点，就是差不多去掉了四分之三吧，大大减少了服务业的网点。这样子，老百姓的生活就很不方便。把一些小的修理这个那个的或者是制造些小工业品的小东西的这么些工业取消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1954年出现了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急躁冒进的倾向，被纠正了。1956年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基本建设的开支超过了我们国家的能够提供的资金，大概超过了三十亿左右，三十亿人民币。这个时候领导国务院工作的以及领导财经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发现了、提出了并且实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毛泽东同志批判反冒进是错误的。既然是冒进就应该纠正，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把它纠正。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邓子恢同志提出过要注意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把邓子恢同志称右倾机会主义者，称为小脚女人，是不对的。他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小脚女人。

第二个缺点，当时已经存在一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就包含了这种因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很明显的，现在平反的冤假错案里头有些案件就是属于那个时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我党历史上的历次的运动包括建国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都带有左的倾向，都带有左的偏向。这些运动都是从反右倾开始，往往是主观地确定打击的比例，还有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不恰当的说法，因此扩大了打击面。这种运动中的左的现象，因为在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党所采取的有些方针偏左而产生的。我们知道在苏区的时候就存在着肃反扩大化，在延安整风审干的时候，也有部分的扩大化，后来在土改整党中间，三查三整运动也有这种问题。建国初期，无论是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镇反，后来的肃反，特别是肃反，反胡风这些都带有这些毛病，都带有这些左的倾向。反胡风是搞错了。整个胡风案已经搞错了。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不久以后还要登报。人家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他有一些错误，但是他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集团，应该给人家平反。历来搞的各项运动都带有左的偏向，是这么个情况。建国初期以来，同样带有左的偏向。

第三个缺点，就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党的领导人就开始有一种过分估计生产发展的高速度，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政治作用的因素。这个反映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序言和按语里面，都有这个倾向。这反映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党的领导人开始骄傲了、不谨慎了，开始陷入了急于求成的空想。所谓大跃进的错误，这个时候已经在萌芽，在发育了。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跃进”这么个思想呢？大概是在1955年，大家可以去看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到处都表示这个，都表现了这个思想，急于求成的思想。

第四个缺点，就是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党的领导人从1956年开始，就感觉到这样做是不对头的，所以有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其它的著作。还有陈云同志的八大发言。不过在这方面还来不及加以改正，以后实际上也没有改变。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计划体制差不多完全是照搬苏联的，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没改变过来。有一些问题我们虽然没有照搬苏联的，但是它的意义也差不多，比方一长制的问题，我们不叫做厂长负责制，我们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我们实行的实际上是党委书记说了算的制度，他和一长制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

总而言之，我们在大略的考察，概括的考察里头，这个阶段党的路线和工作是取得了很大胜利和成就的，但是仔细地去分析，仔细去考察，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成绩中间还有不少缺点。

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必要的，斗争的方针方法也是正确的。因为高岗、饶漱石他们确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反对刘少奇同志，反对周恩来同志，企图做党的副主席，并且要当国务院总理。他们进行了很多活动，挑拨离间。因此，反对他们分裂党的活动的斗争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斗争的方针、方法也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不能翻案的。这个斗争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和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对于保证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说这个斗争对于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有重要的作用呢？因为高岗是得到苏联支持的，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斯大林把高岗看作是中国现代的张作霖，是个地方军阀。因为当时张作霖一方面依附于日本，另一方面也依附于俄国。他把他看成是地方割据的一个首脑人物。如果说有什么人里通外国的话，那么高岗就是一个，彭德怀倒不是的。高岗是里通外国的。因此，我们粉碎高岗、饶漱石的分裂党的活动阴谋，对于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56年9月举行的八大，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八大对于阶级关系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那么这就是八大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阶级关系的分析。那么，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在这种变化了的国内形势下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八大提出的任务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任务，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以前的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这还占很大的成分，到这个时候呢？主要任务是

发展生产力，不是进行阶级斗争，不是改变生产关系，而是发展生产力。八大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同志们听说都做了很详细的讨论。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认真看待这个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这方面的情况，因此，后来作为残余形态表现出来的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面前，又发生过夸大它的严重性的情况，以至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些问题。

第三个时期，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或者叫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时期，1957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曲折地前进的。它包括了路线正确、错误、正确的过程。党的路线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开头的一段还是正确的，特别是1957年1月到5月的这一段，如果从八大结束时算起，自1956年10月到1957年5月。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以后，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社会矛盾的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发展。这个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正确的。然而，接着从1957年5月到12月，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这样讲不是要肯定反右派的斗争，恰恰相反，我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当时对于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对广大的群众进行教育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这样做也是必要的，现在也还有一些右派分子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发动一场全国范围的划右派分子的群众运动是错误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反右派斗争这个运动的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扩大化到什么一个情况，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据统计全国的右派分子大概有55万人，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这55万人到现在为止清查的结果，有98%都搞错了的，都改正了，只有2%现在没有改正。在没有改正的人里头，有些他确实是犯了算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的，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标准了。但有些，他是因为说了些不正确的话，但有的历史上又有些问题，历史上比方说是历史反革命，这些人就不给他改正。所以这2%里头，还包含了一些老帐新帐一起算的问题。可能有一些还不够这个右派分子的这个标准的。再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是一定要划，一定要戴帽子？完全可以不划，大家知道他有这个错误就行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很有名的梁漱溟，他是经常要批评共产党甚至反对、攻击性的言论也有。我们党对他进行了批评，批判他的错误言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给他戴帽子。什么时候给梁漱溟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呀？没有，到现在没戴。不但没有戴，而且他还是政协委员，最近他还被提升做政协常务委员了。那么留他在那里做样子让大家看，我看也没有什么害处。所以戴右派分子帽子这事啊，是不必要的。反右派斗争本身就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过从当时整个党的工作来看这个错误还是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还没影响到党的全部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1957年从5月中旬以后到12月恐怕还不能说党的路线是错误的，基本上

还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因为这一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从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来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反右派斗争中间采取了一个所谓“四大”的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用“大字报”来围攻这么个办法。有的时候也叫做鸣放辩论的方法，这是一种强制的方法，是一种强制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所以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反右派斗争中的这种方法后来就运用到所谓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间去。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都是反右派运动的错误发展和进一步的扩大。这是一段。1957年这一段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958、1959、1960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并且是全局性的，影响了和包括了党的全部工作的错误。所谓“大跃进”的错误，“大跃进”，我们现在是把它打上个引号，因为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大跃进。“大跃进”的错误是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批判反冒进就是要冒进，就要号召在全国实现个大冒进。这一年的3月，1958年的3月，党中央在一个文件里头正式号召“大跃进”，打了引号的“大跃进”。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同志甚至这样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写在历史上应该说是很滑稽的。冒进就是冒险盲目地向前冲，叫做冒进嘛！冒险地前进嘛！冒险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冒险倒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就是从文字上来说，也是违反逻辑的。可是他老人家居然地说得出这种话来。批判反冒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批判周恩来同志，也批判陈云同志。所以，批判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的反冒进开始了一个大冒进，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过高的指标，而且终于拍板定案，到了7月8日就定了下来，在这一年钢要翻一番，粮食也要翻一番，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完全不可能的。按照现在我们知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管在哪个制度下，一年翻一番，根本没有这可能，现在还没有过这样的奇迹，但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是要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个高指标下，号召“大跃进”。在确定钢铁翻番、粮食翻番的高指标下，还加上个人民公社运动。刚建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下来，又不让它巩固了，马上就翻上去再提高一级。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很多穷富不等的队，把它合并在一起，统一核算，这不是穷富拉平了吗？这不是共产风吗？其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完全拿来充公，这不是共农民的产吗？共富队的产，共农民的产。这股共产风是党中央确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就包含着因素，必然要这样，必然要刮共产风，因为它本身规定的就是剥夺农民的办法，要把穷富不等的、好多个高级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要取消自留地，就是这么一个办法。所以说刮共产风是基层干部在那里刮的。不是的，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要实行人民公社本身就包含了刮共产风。这就是一个剥夺农民的错误的办法。现在人民公社这个牌子还在挂，但是实际上原来人民公社的内容已经不存在了，什么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统一好领导，这个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现在还叫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个运动，就是全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的工作，都是用群众性的鸣放辩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来强制推行的。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党的领导人又陷入了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倾的空想，或者象彭德怀同志所讲的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说到要点上去了。当然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党中央的其他的领导同志对这个错误也有责任，对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当时也有责任，因为他们的头脑也发热了，以为可以快一点过渡到共产主义，所以表示赞成。但是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错误要负主要的责任。毛泽东同志首先提了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理想的这种先验的模式，北戴河决议里头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的宣告，宣告了这样一个论点，很快地就可以过渡共产主义去了。还有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的讲话，1958年七、八月在北戴河发表的一个讲话，主张废除工资制度而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党的领导人的思想里头有一个相当成系统的“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这个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是空想的，是代表农民的那种平均主义的偏见的。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58年底发现了工作中间有“左”的错误以后，开始采取措施来限制这种“左”的错误的发展，并想加以改正。1959年上半年继续做纠“左”的工作，但是纠“左”是在肯定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正确以至于完全正确，所谓伟大成就这个前提下来进行的。所以理所当然地遇到了阻力。底下执行了这个“左”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个“左”的错误路线的各个省委书记以及各级干部也想不通，你说我执行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又批评我工作中间有“左”的错误，他就不承认有“左”的错误。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样子所谓纠“左”就遇到了阻力。在“左”的错误还没有根本纠正的情况下，或者说基本上还没有纠正的情况下，1959年下半年又错误地批判了提出正确意见的彭德怀同志，错误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得“左”的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更加不可收拾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下半年。所以全局性的错误大概持续了两年多到三年。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说1958年到60年的“左”的错误，只是局部性的错误而不是全局性的错误，我认为是不通的。我认为应该干脆地指出，明确地指出，1958年到1960年毛泽东同志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现在有很多同志也是这样讲的。我赞成这个意见。

党的领导的错误是造成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的主要因素。这三年困难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使得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志们都知道，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意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什么意思，饿死了多少人？比方在你们安徽饿死了多少人？党的领导工作中间的错误是造成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的主要因素，加重这个困难的是另外两个因素，就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对于苏联压服中国和控制中国的狂妄企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这个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的。毛泽东同志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已经变修了，变质了，并且做出了一些正确地分析。比方他在关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头指出，苏联的宪法，以及苏联的经济学

教科书空谈苏联劳动者有这个权那个权，比方说有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唯独不承认他们有管理国家和管理文化教育这个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这个分析我认为是对的。又比如他指出苏联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东方西方的学者都指出，苏联特权阶层是在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的，赫鲁晓夫把这些都继续下去了。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当然，毛泽东同志和那个时候的党中央对于苏联的变修也做了些错误的解释。比方把按劳分配、奖金、利润等等都说成是修正主义，这就不对了。“九评”里头包含了一些错误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本质上还是正确的。

因为发现情况严重，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了彻底纠正“五风”的紧急指示，这个时候起开始认真地改正“左”倾路线的错误。12月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1961年、1962年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经济，很快就收到了成效。1961年到1966年，是党为纠正错误而斗争的六年，这六年党实际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所谓基本正确，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的错误是由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同意之下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纠正“左”的错误当时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哪些同志呢？毛泽东同志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可以说是起了主导的作用。他主持制订了十二条以及后来的六十条。在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纠正“左”的错误那是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起了主导的作用。也不能说毛泽东同志自己没有做纠正错误的工作，但是大量的工作是其他同志来做的，大概是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他就是纠正“左”的错误，也没有指出他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他是不承认的。反右倾的错误大部分纠正了，大部分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同志，给摘掉了。但是纠正得不彻底。庐山会议的错误的决议没有撤销，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张闻天同志、周小舟同志，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反右派斗争中间扩大化的错误虽然已经提出来了，但是没有纠正，他拒绝纠正，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此一句话下去，也就纠正不了。总起来说，对于“左”的错误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没有加以清算。谁都不能够说这是一个“左”的错误路线，不能说这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这样说。就是1962年这个总结历史经验的七千人大会，也是很不得底的，是在肯定所谓党的路线的正确底下来总结经验的，这个就不是实事求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路线的错误，这是很明白的。1958年的总路线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过去我们一直说1958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对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为，这个路线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这是主观主义的总路线，因为它只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去建设社会主义，至于采取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方针，怎样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这里是没有反映的。这个总路线开头只有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要求快快快，要大于快上，就是这个，这就很难说是正确的路线。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也可以暂时不作结论。但是实际的工作，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它所推行的是高指标和共产风，这个当时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对于这个当时没有清算。没有分析这个错误

从那里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的错误。因为彭德怀的事发生以后谁也不敢讲这个问题了。彭德怀讲得很正确,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彭德怀同志,当时也没有说是路线错误。这个更不敢说了。他说路线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工作中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个左的错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纠左比纠右反右还要难,要很重视这个纠“左”的工作。他作了这个发言以后,他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也没有提出这个错误的性质问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更没有清算它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所以我们在上面讲,基本上是把那个错误纠正过来了,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来了,但思想上没有纠正。思想上甚至没指出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左”倾的路线错误。由于“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没有清算,因此就不可能彻底纠正,更不可能避免重犯。所以,1958年的错误同后来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不能割断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左”倾路线错误,是1958年到1960年的那个“左”倾路线的进一步的登峰造极的发展。

由于对“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没有加以清算,因此就不可能彻底改正而避免重犯,相反地“左”的错误思潮还在继续发展。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这就出来了一个新的因素,在反右派斗争中,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段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上面不是讲了嘛,八大讲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1956年基本解决,但是反右派斗争中和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讲话,我们党中央的文件里头,反映出来的是轻率地把这个估计推翻了,认为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个特别清楚地反映在1958年5、6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间。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就把这个主要矛盾的时间更延长了,延长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在这时候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把这个错误的论断延长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四清运动,也就是在这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下发生的一个错误。虽然这还是局部性的错误,因为全国农村三分之一进行了四清,还有三分之二还没有进行四清。当时党的整个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从大的方面来说,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成绩还是主要的。

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对纠正四清中间的“左”的错误尽管起了一定的作用,解放了一些基层干部,但是,更重要的是“二十三条”在三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一个就是认为中国无论在城市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个形势估计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个是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认为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就是提出了一个不科学的“走资派”的概念。这些就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严重更加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止,有将近十年半时间。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左”倾路线错误,

事实上已经作了结论。四中全会通过的去年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从形势估计到斗争的方针方法都是错误的。五中全会的公报说，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事实上这些提法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全局性错误，是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左”倾路线错误。

毛泽东同志是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要对这个错误负主要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同志可以说要对这个错误负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个运动是他发动的，特别是有很多的同志被打倒以后，靠边站以后，他们就不能负责了。

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继续工作的那些同志是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幸亏有周恩来同志的努力，才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同志始终反对派性，反对打倒一切，反对全面内战，始终坚持团结、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继续进行生产，维护和恢复工农业生产。因此，周恩来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对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的杰出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所以成为浩劫，成为悲剧，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左”倾路线错误，并且把它推向极端，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大破坏。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是有联系的，因为毛泽东同志除了提出“文化大革命”这条“左”倾路线错误能够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以外，还重用了林彪、“四人帮”。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毛泽东同志的问题还是共产党员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的问题，还是属于好人犯错误，他的主观愿望还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前面所说的是“左”倾的空想。但是林彪、“四人帮”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他们的问题是属于反革命进行破坏的问题，他们从事的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主要方面，是错误，是灾难，是浩劫，是黑暗。但是这十年中间也有光明的一面。在这十年中，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主张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对外政策中，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和平的外交路线。这当然不是说，在对外政策、路线方面，就没有一点缺点了，比方有些过“左”的东西，也影响了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但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和平的外交路线，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相当严重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离开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但是他又没有完全离开，因为他始终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还对他们有批评，并且解放了不少的老干部。这些就使得我们党后来比较容易地粉碎了“四人帮”。

在这期间，广大的群众，广大的干部，特别是老一辈的革命家，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和“八大”以前的正确的路线，对于“左”倾的错误路线进行抵制，特别是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用各种方式进行了反抗和斗争。这就证明，在十年动乱中，我们的党还是存在的，党的事业没有中断。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已经改变了性质的看法是不对的。党的事业没有中断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遇